

前 言

这是一部长篇纪实文学。

不是档案材料。不是文史资料。没有面面俱到。

我过去所见过的多数作品，周恩来都是文质彬彬、风度翩翩；热情可亲，和蔼慈祥；兢兢业业，忙忙碌碌；谦虚谨慎，委屈求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多次见过周恩来总理，我不满那些作品描绘的这一形象。我采访到的人也都不满这一形象。就像一张黑白照片，只有阴柔没有阳刚，只有暗影没有光线，朦胧且远离了真实。

我无意否定过去的任何作品，只想在暗影上增加一层光线而得到立体。

不要误解周恩来忙忙碌碌，事务主义，他其实至高至圣，是伟大的思想家；

不要误解周恩来拘谨韬晦，他其实至情至性，常常洒脱不羁；

不要误解周恩来阴柔委屈，他其实阳刚十足，火辣辣地激荡奔放；

不要误解周恩来吞声忍让，那其实是大智大勇，最有自知和知人之明……

你见过周恩来“当仁不让”、“非我莫属”的“人主”

气概吗？你见过周恩来雷霆震怒，脾气大发的神威吗？你见过周恩来“将进酒，杯莫停”，“会须一饮三百杯”的雄风吗？你见过周恩来大哭大笑，大愤大骂的大丈夫劲吗？你见过周恩来山崩面前，地陷身后，血雨腥风，也只一笑而过的英雄静气吗？……

不知道？你心中的周恩来就缺少阳刚，缺少光线，也就失去了立体。

我的采访中，对同一件事，从来是 10 个人有 10 种说法。由于年代、记忆、经历、视角特别是文化层次的不同，说法完全一致是不可能。

所以，我的文章在某些时间、地点、人物、对话乃至对事件的陈述，可能与历史事实及部分当事人的记忆、看法有出入。

允许批评、指责，乃至咒骂、起诉。

书中的何树英，1940 年跟随周恩来，历任警卫、副官、行政秘书、机要秘书、卫士长。他是曾经工作在周恩来身边的一大批同志的代表，不是生活中具体的那一个人。

他也是作者笔下的人物，其中不乏作者“顽强的自我表现”。

他的真实来历，作者最终会有个交待。

1966 年 8 月 17 日，在中南海小礼堂，周恩来近在咫尺地同我们“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南下兵团”的负责人座谈 7 个小时。合影后，他登上“红旗”车，准备去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宾。

我目睹工作人员递给他一杯玉米面糊糊（或者是麦片粥？）两片面包夹肠。

车开走了。苍茫暮色中，我仿佛又听到周恩来的声音：

“你叫什么名字？”

“权延赤。”

“担任什么职务？”

“南下兵团二纵政委。”

“噢,政委。”总理依次问过几个人的‘职务’,大声感慨:“你们刚参加革命就都当上司令政委了。叫什么名称关系还不大,脑子里怎么想的却很重要。我们共产党人闹革命决不是为了作官,而是要为人民服务,要做人民的勤务员……”

那以后,我又几次见过周恩来,悄悄而认真地观察他的音容举止。应该说,我的这本书从那时便有了一点点萌芽……

引子 周恩来不是帅才

一位日本人看过我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对我说：中国在半个多世纪里是属于“神圣”的，这个神是毛泽东，这个圣是周恩来。

他的目光分明是问：你把毛泽东请下了神坛，是否打算把周恩来请下圣坛？

所谓请下“坛”，其实就是让他们回到人间，回到尘世；不但可敬，而且可亲。他们的伟大、高尚、英明，绝非可望不可即。他们生前不曾须臾离开人民，他们死后，精神融于民众，决不该成为人民顶礼膜拜的偶像。

比如，在我们 5 千年的文明史中“禅让”，是受到最高赞誉的大公无私的圣人之举；没有几个人能做到，所以也没有几个敢称圣人。

于是，便有许多人联想到周恩来，或明确或含蓄地讲：周恩来不当一把手（帅），不当二把手（接班人），甘当三把手，这是伟大的谦虚。

这些人可以列举许多实例，比如遵义会议。说 20 年代和 30 年代初，周恩来在党内的名望和职务都高于毛泽东，他用自己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威望支持毛泽东，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自己甘愿做他的助手，这种谦让精神贯穿了他的一生。

我的观点不同。周恩来无疑是谦虚的，这表现在他的不耻下问，善于向别人学习；表现在他的民主作风，勤于听取群众意见；表现在他总是乐于自我批评等等，而不是表现在不当一把手，也不当二把手。

有人说伟大的谦让，就不可避免被另一些人说成是“明哲保身，勇气不足”。甚至归结于“绍兴文化”的影响。说绍兴的文化人不应科举，不作县令，只作师爷，以致于中国“无绍不成衙”；人们说师爷往往不说师爷，而说“绍兴师爷”。周恩来的祖父、外祖父都是当师爷出身，说他们的处世哲学不可避免地对周恩来有影响。

我的观点是：周恩来不当一把手（帅），不当二把手（接班人），在“宰相”位置上鞠躬尽瘁 27 年，并可由此上溯至红军战争时期，从那时起他就一直是处于主要的辅佐位置，被许多老人比喻为“军师”，事实上的“总参谋长”，这一切都不能叫作伟大的谦让，而是伟大的自知之明和知人之明。

周恩来明智地说：“我不是帅才。”

明智决非明哲保身，不明智只是匹夫之勇。

匹夫之勇不是勇；是鲁、是莽、是愚。

最大的勇敢莫过于看清事实而敢于实事求是。

王明、张国焘不是帅才强要作帅，结果一个跑去苏联，寄人篱下；一个投降国民党，仰人鼻息。又何以论勇气，逞英雄？

周恩来不是帅才。

我曾经难以容忍这个观点或这句话，以为这是对我心目中至圣至伟的周恩来的莫大侮辱。现在，我首先公开说出这个观点这句话，可能要遭到指责、批判，但我坚持说：这是事实。我劝那些容不得我这个观点这句话的好心的同志想想我曾想过的问题：

如果我说雷锋活着也不适合当军长、师长，你怎么想？
让科学家去种地，去打扫卫生是错误的，那么某省一度让农业劳动模范去当公安局副局长能是正确的吗？能是真正爱护这位劳动模范的明智之举吗？

班长这个位置并不影响雷锋的光辉。

我们难以改变的一些旧观念才往往好心帮倒忙，爱得深却不会爱，反而损害了心中深爱的人。

毛泽东能够领导全党全国人民成就开天辟地之大业，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知人善任。处于新中国权力顶层的领袖人物，曾被老百姓简化成：毛刘周朱陈林邓。毛泽东对他的这些战友、同事是怎样的看法和评价？

国家经历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想陈云，讲了“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又讲了曹操败于赤壁，思念郭嘉的故事。

毛泽东让林彪当接班人时，讲了“为要打鬼，借助钟馗。”

对另外 4 名战友，毛泽东在莫斯科有个谈话，分别作了评价。

那是 1957 年 11 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党代表大会，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这两个会议，主要的活动是会前的双边、多边接触，主要是中共与苏共的谈判，协议有了才好开大会。

那是赫鲁晓夫第四次来陪毛泽东用餐，餐桌上谈得仍然不愉快。离开餐厅，来到会客室，毛泽东转了话题，撇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通报中国党的情况。

“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了。”毛泽东望着赫鲁晓夫，语气庄重。

赫鲁晓夫并不感觉意外，因为 1954 年毛泽东就讲了不想当国家主席的话，他讨厌诸如迎送国家元首，接受各国

大使递交国书一类国事活动。半年前，伏罗希洛夫访华，毛泽东再次表明不当国家主席的决心，伏罗希洛夫带回了这个信息。

“有人接替吗？赫鲁晓夫眨着眼问。

“有。我们党里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毛泽东综合评论后，便搬动手指，如数家珍：“第一个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这里学习，1921年转入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政治上坚定，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

“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听到过这段评价的中国同志都想不通。外国的共产党人也明白，评价上的前后矛盾显然出于政治原因，而非实事求是。

“第二个是邓小平。”毛泽东搬下第二个指头。在场的同志都印象很深，因为按声望和职务，大家都以为该说周恩来了，但毛泽东先说了邓小平。“这个人政治性强，思圆行方；既有原则性，又有高度的灵活性；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很有发展前途。”

赫鲁晓夫忽然苦笑：“是啊，我也感觉到这个人很厉害，不好打交道。他观察问题很敏锐……”赫鲁晓夫收住嘴，作个手势，表示办事坚定果断的意思。

毛泽东也笑了，他知道邓小平在两党谈判中使苏联人日子不好过。他在面前竖起一根手指表示强调：“今后他到这里来，同我到这里来一个样；你们怎么对待我，就怎么对待他。”

当时在场同志对这段话记忆深，是因为毛泽东对邓小平评价高又惟一没讲缺点。

毛泽东继续搬下第三根指头：“第三个是周恩来。这个同志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

但是周恩来政治上弱点……但他是个好人。”

赫鲁晓夫点点头，说：“咱们都是 60 多岁的人了，我们这里将由柯西金接替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米高扬也是政治上原则性不够强，拿掉谁他都难过……但他是个好人。”赫鲁晓夫舔一下嘴唇，又情不自禁地补充说：“不过大家还是希望由我来管全局。”

毛泽东已经搬下第四个指头：“朱德同志年龄大了。他德高望重，”毛泽东略一停顿，加重语气，“威望很高。但你不能指望他主持工作办大事了，年龄不饶人。总之，这些人不管谁到这里来，希望你们都把他們像我一样来对待，都看作是你们的朋友。”

“那好，我们一定会这样做。”赫鲁晓夫晃动一下右手食指：“实际上他们也是我们的朋友。”

毛泽东这些评论语言，言简意赅应该说是深刻而又实事求是的。建国后，周恩来多次坦率地讲：“我不是帅才。”

在一次涉及人事分工的会议上，毛泽东望住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来怎么样？”

周恩来摆手：“不行不行，主席，你是了解我的，我不是帅才。我理理家可以，作不了帅……”

邓小平也曾在一次会议上坦率地说：“周恩来同志不能当主席的接班人，不是帅才。”

董必武点头，慢条斯理地说：“总理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很好的大管家。”

我们如何理解领袖群中这样一致的看法？或许薄一波的回忆可以对我们有所启发。

1950 年 6 月 6 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因为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毛泽东的报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所以全会期间，周恩来曾与中财委的薄一波聊天，谈论稳定物价等问题。

话一聊开，内容渐渐广泛。周恩来想到什么事，带着思考的神情问：“一波同志，你在晋冀鲁豫同伯承、小平共事多年，你对他们二位的工作怎么看？”

薄一波说：“他们在工作上配合得很好，确实是同心同德，和谐有致。”

周恩来笑着摇头：“我不是讲他们的配合，而是问你对他们的工作方法怎么看？”

薄一波诙谐、幽默，聪明地反问道：“总理，您是老领导了，又跟他们相识甚早，您看呢？”

“好啊，”周恩来爽笑道，“你又把问题原样奉还了。”

薄一波也笑：“不是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吗？我这叫解问题还需提问人嘛。”

周恩来敛去笑容，思考着说：“据我多年观察，他们两人的工作方法各有特色。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伯承同志则是‘举轻若重’。你看是不是这样？”

薄一波连连点头：“完全同意总理的评价，这八个字概括得很准确。他们在工作上所以配合得那样得心应手，恐怕这是一个重要因素。”

周恩来仍然是一副凝重的思考神色：“那么，这两种工作方法你比较喜欢哪一种？”不待薄一波回答出他的所选，周恩来已经沉思着继续讲下去：“从愿望上说，我更欣赏小平同志的‘举重若轻’，但说实在话，我这个人做不到这一点。我同伯承同志一样，在工作上常常是‘举轻若重’。这也许是同我长期负责具体的执行工作有关吧……”

无疑，总理对自己有着深刻的认识，并且乐于承认。他确实做不到举重若轻。他的外事秘书陈浩，见他三更未眠，五更又起，日理万机，辛劳过度，曾忍不住劝说：“总理，有些事你不要管得太细；又管这又管那的，一个人的精力哪顾得上那么多呀？”

周恩来忽地从办公桌后立起身，真生气了。他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扇动着大声问：“你看看，这事我不管行吗？”

总理扔下这份文件，又抓起另一叠文件：“你说，这些事我不管行吗？”

接着，他又拍拍第三叠文件：“这几件不管也不行！”

他疲惫而又委屈地叹口气：“别人不知道，你们还不知道吗？总是这样来说我！”

事无巨细，总理拿起就不肯放，放不下。

有些人喜欢用“日理万机”搞歌颂，见了领袖人物就说“百忙”，就说“日理万机”。

用滥了，根本不准确。

日理万机的只能是“宰相”。为“帅”者只能举重若轻，以这种气势胆魄去作战略决策和决断重大事件；只有举轻若重才会出现日理万机。这不是基本常识吗？

总理对各省市各部委领导爱讲一句话：“你们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找我，直接给我办公室打电话。”

总理对他的秘书们也爱讲一句话：“你们有事一定要报告，不要怕我忙么，我不怕忙，我能忙过来。”

一位秘书对我讲，他见周恩来忙得两天没合眼，忍不住说：“总理，首长里面就数你忙了，这些材料可以送给小平同志去看么……”

周恩来往太阳穴上抹抹清凉油，继续批阅，一边轻声说：“我是总理。这些具体事我多干一些，他可以去管点更大的事，多想想决策上的事。”

总理讲这个话的时间是国家进入困难时期那一年，说明他那时就肯定了小平同志举重若轻的帅才。

有些事是那些部长、司局长都不屑一顾的琐事、小事，周恩来不但乐于管，而且管得仔细认真。毛泽东在听到几件这类事后，曾对许多人感慨：“还是我们的总理啊，上至

国家大事，下到服务员的工作都关心到了！”

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曾对毛泽东说：“我真羡慕你有个周总理，我们就缺一个周总理。”

尼克松与周恩来接触算不上多，却在一面之后即对周恩来的“举轻若重”大发感慨：

周恩来也具有另一种罕见的本事：他对琐事非常关注，但没有沉湎于其中而不能自拔。我们在北京的第三天晚上，应邀去观看体育和乒乓球表演。当时天已经下雪，而我们预定第二天要去参观长城。周恩来离开了一会儿，我以为他是去休息室。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亲自去关照人们清扫通往长城路上的积雪。第二天，路上洁净得如同不曾下过雪似的。这个例子是很典型的。

我还发现，在机场欢迎我们的仪仗队是周恩来亲自挑选的。这些士兵身体健康、魁梧，穿着整洁。周本人还亲自为乐队挑选了在晚宴上为我们演奏的乐曲。我相信他一定事先研究过我的背景情况（事实上正是如此），因为他选择的许多曲子都是我所喜欢的，包括在我的就职仪式上演奏过的《美丽的阿美利加》。在结束这次旅行后，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告诉我：有一次，在他与周恩来会谈之前，进来了一位年轻的妇女，递给周恩来一份报纸清样请他过目。这是周为第二天报纸编排的头版。

对于周恩来来说，任何大事都是从注意小事入手这一格言是有一定道理的。他虽然亲自照料每一棵树，但也能够看到森林。

毫无疑问，当我们赞颂周恩来“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周密细致，扎实稳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时，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联想到诸葛亮，但我相信不会有人想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

对于一个人来说，不可能兼俱“举重若轻”和“举轻

若重”的两种优秀品格。但对于一个事业来说，必须兼有这两种优秀人才。

曾有一位老干部不解地对我说：“哎呀，有些事小平同志就真能放得下手，就真敢放手不管交别人管。”曾有更多的老干部跟我谈起他们接触邓小平所目睹他“举重若轻”，“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故事。

其实，这正是帅才所必备的优秀品格。若无这种大气势，他怎么可能成为继毛泽东之后，又一个改变中国历史，改变中国命运的伟人巨人？

我还要说的一点是：周恩来的伟大高尚决不在于他是否是帅才，而在于他在自己的位置上怎样做的？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和业绩？

当毛泽东从延安飞重庆，以大手笔感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和那位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俱往矣”时，周恩来却在这条路上丢开秦皇汉武不看，只看了张良庙和武侯祠。

当毛泽东赴莫斯科同斯大林谈判，津津有味地读着彼得大帝和拿破仑时，斯大林着急地说：“你不行，这些具体事你谈不清，你叫周恩来来谈”……

我创作中的书，正是要由此谈起。不过，谈话者将不再是我，而是跟随总理几十年的何树英同志。

三次预见预言

总理是讲过自己不是帅才，邓大姐也这样说，我们听了不舒服；主席和小平再这样讲，我们曾感到委屈。现在回想起来，是传统文化、传统观念影响我们的结果。谁位高，谁就位尊德高；准官大，谁就本事大、贡献大。中国过去就是这种观念，这个毛病。改变不容易。雷锋只是一个班长，说起他全国没人不知道，但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知道他的军长、师长是谁？话又说回来，许多人还是想当军长不想当班长；所以说改变不容易。

总理讲他做不到举重若轻，但同样的，主席和小平也做不到举轻若重。不拘一格降人才，我们的事业才能兴旺发达，我们的目的才能实现。

1949 年 12 月 16 日，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没多久，1950 年的 1 月，忽然传来消息，说谈判不大顺利，叫周恩来总理立刻启程去莫斯科。

那次，我作为随员跟总理一起出发，路经满洲里时，遇到了率团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萧华同志。

萧华向总理汇报联欢节情况，总理望着他身后问：“怎么没见到维世啊？”

孙维世是总理的干女儿，本是同萧华一道去参加联欢节。总理没见到干女儿，自然要关心。

“我们路过莫斯科时，她被师哲扣下了。”萧华解释，“师哲说她俄语好，叫她留下参加翻译组的工作。”

总理关心中苏谈判：“主席跟斯大林谈得怎么样？”

萧华摇摇头：“好像不大顺利，师哲只跟我简单讲了几句。”

总理想了想，问：“主席现在做什么？”

萧华说：“斯大林说要等你来了再谈，先安排主席参观和看节目，听说到列宁格勒参观去了。”

总理沉思着点点头，没有再问。当时在场的有伍修权、赖亚力和我，我是刚由副官改为行政秘书。

赶到莫斯科时，我从师哲那里听到的情况，与萧华讲的差不多。

总理一到就开始了紧张的谈判，主席就退到“二线”，只管大的方向和原则。除了决策，具体怎么谈的他不管。

我印象最深的是，主席在莫斯科没什么事，每天就是看书，看得废寝忘食。

记得有次吃午饭，主席的目光总是朝我脸上瞟，看得我有些不自在了，不知自己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引得毛主席这样注意。我下意识地拿手去脸上、嘴巴周围擦，怕是沾上了食物，同时尽量注意吃饭的动作文明些。

当我的目光再次和主席相遇时，他忽然笑了，指指我说：“我看你长得像拿破仑。”

我不好意思了，尴尬地跟着笑，不知道拿破仑长什么样？哪一处跟我相像？

毛泽东并不知道我的姓名和职务，但知道我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他转向周恩来说：“这些天我一直在看历史影片。看完了彼得大帝和拿破仑，”

说到这里，毛泽东拿起酒杯，朝我一举：“来，跟拿破仑干杯！”

欢笑声中，我脸红红地跟毛泽东碰了杯。

毛泽东朝想象中的“拿破仑”点一下头，喝了半杯。我这个“拿破仑”一饮而尽。从此，相当一段时间里，有人开玩笑叫我“拿破仑第二”。至今我也不知道我什么地方长得像拿破仑？

在毛泽东观看研究彼得大帝、拿破仑期间，周恩来谈成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

当然，这些谈判的大政方略及原则，都是毛泽东确定决策的。他当时有句著名的确定谈判目标的话，就是“想要点好看的，再要点好吃的。”“好看的”是“同盟条约”，“好吃的”是“贷款协定”。

这次中苏谈判的情况，很能反映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及各自无法取代的作用。

早在西柏坡时，联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与周恩来交谈后，对师哲等人说：“周恩来将是中国新政府一位很好的总理。”

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斯大林对中共代表团说：“你们将来一建国，现成就有个总理，周恩来。”

30年后，国际上许多政治家评论：“在半个多世纪里，中国是被置于毛泽东的头脑里，同时也被置于周恩来的手掌中。”

是斯大林高明还是国际政治家们评论得深刻？我认为周恩来比他们都高明都深刻。

我1940年5月4日来到周恩来身边当警卫，一星期后即随他由延安奔赴重庆，以后历任副官、秘书、卫士长。

周恩来无疑是一位鞠躬尽瘁的实干家，但他首先给我的印象是伟大的思想家。

从设计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蓝图到国际关系上的“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反对霸权和霸权主义”；这些天才思想已经早为国际国内所共知。

我要讲的新内容是周恩来的三次预见预言，其中无疑闪烁着伟大思想家才能独具的智慧的光辉。

第一次预见预言就发生在我刚到周恩来身边，随他奔赴重庆的路上。因为刚到首长身边，一切都新鲜激动，所以记忆非常深。

像毛泽东和周恩来这样伟大的人物，与生俱来的都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就是“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毛泽东气吞山河地高歌：“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当毛泽东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乃至那位一代天骄统统踩于脚下时，周恩来又在想什么？干什么？

他也不迷茫。他已经勇敢、自信、明智地选定了自己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上的位置，并且当仁不让地在这个位置上坚持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那天，我们 100 多名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跟随周恩来，分别爬上 3 辆卡车，开始了艰苦的旅程。

经宝鸡、凤县，卡车在崎岖的土石路上颠簸，午后驶入一道大山沟子。

沿途景致在悄悄发生变化。陕北高原受雨水侵蚀，形成塬、峁、梁、沟如大海一样波状起伏的地貌。

而这里，山间原有的自然风貌仍然存在；仰面眺望，千柯争翠，万木葱茏。5 月的阳光下，在寂静的热气中花草的芬芳悄悄蒸腾，那些挡住视野的陡壁岩石不时地闪出青色白色的反光。

拐过一道弯，卡车哼了一声，我听到有人嚷嚷：“苗台子镇！”

前方轻烟缥缈，笼罩了一片建筑物。卡车停在了镇西。

“都下来吧。”车门开了，传来招唤：“去看古迹！”

我们 100 多人纷纷跳下车，心里不免纳闷：这一路多少古迹啊，从没说过看看。特别是在西安，住的时间长，名胜古迹又多，还不时有各方人士邀请，周副主席却一处未看。如今特意钻进这大山沟子来看什么古迹？不理解！

周恩来已经下车。他一露面，我们这些警卫就本能地摸住腰间的德国 20 响快慢机，环绕着警卫在四周。

我近在咫尺地看着他眺望着下车，眺望着立住脚，就那么保持眺望的姿态站了很久；双手环抱胸前，肩膀随着深呼吸起伏，一副久违了的神情，像游子终于回到故乡，带着静谧无言的激颤要寻回遥远的记忆……

“周副主席来过？”当时的副官老钟小声问。

周恩来摇摇头，没作声。在他最突出的特征——两道浓浓的黑眉毛下，波光闪烁的两眼显得含情脉脉，神思悠悠。

我是第一次见他这么动感情，印象太深了。此前他从来不曾这样，他属于那种善于驾驭感情的人。记得路经洛川时，国民党一名军长来拜见他。这位军长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教过的学生，见面那一刻，军长叫了声“老师！”整个脸孔、嘴唇和敬礼的手就都激颤起来，感情无法抑制地奔过来用双手抢握周恩来伸出的手。周恩来不那么感情外露；热情而不失常，亲切而不变态，关心而不形于色；那种从容似春，大度似海的风度直令我心灵震颤，立刻被迷住了。那时我还不明白这是人类文明的力量，我只感到他与我过去见过的所有人都有某些不同，虽然说不出不同在哪里？那一瞥目光，一个微笑，一次握手，一声问候、甚至举手投足都有着既生疏又一见如故的亲切感人的魅力。

然而现在，面对一片自然山野，他却意满神动，柔